



国际关系学
当代名著译丛

王逸舟/主编

女性主义

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

Christine Sylvester

余潇枫 潘一禾 郭夏娟/译 郭夏娟/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

Christine Sylvester

余潇枫 潘一禾 郭夏娟／译 郭夏娟／校

女性主义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2-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 (美) 丝维斯特著; 余
潇枫, 潘一禾, 郭夏娟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2

(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

书名原文: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ISBN 7-213-02497-3

I. 女... II. ①丝... ②余... ③潘... ④郭...
III. 女性主义 - 关系 - 国际关系 - 研究 IV. ①D440
②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781 号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by Christine Sylvester

Copyright©199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2 by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美]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 余潇枫 潘一禾 郭夏娟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7.6万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497-3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秩序已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尚未形成,21世纪会是什么样的世纪?全球化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同时又给各国的主权、管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护自己的利益?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面临的安全隐患是什么?对所有这些问题西方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都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对时代主题、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而对这些课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答卷,况且对国外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知之甚少。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做一些引进工作。

从文化视角看,文化是多元的,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世界各地独立地发展出富有特色的多种古老文明,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玛雅文明等。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及当今科技的飞速发展的现实必然会促进文化的交融。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拒绝接受外来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消极保护只能是停滞落后。因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认定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后,更需要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

2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了解最新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也鉴于国内至今仍然缺少一套以近一二十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前沿课题为介绍对象的译丛,我们认为翻译出版这套书系是很有必要的。

该丛书的主要特色有:第一,全部著作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名著;第二,全部著作由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或正在崛起的中生代代表人物撰写;第三,基本上是近一二十年新近出版的作品,国内没有完整地翻译过;第四,选择不同流派、不同主题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力争呈现不同风格;第五,希冀能满足中国学者、学生的各种阅读兴趣,能成为国际关系专业老师、学生的教学参考书;第六,希望能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作品出版史上产生历史性影响。

当然,这些作品的作者均来自西方,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及立场肯定与我们有所不同,有些可能与我们相左。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学会分析,去除糟粕,汲取精华,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服务。

总 序

王逸舟

在新世纪之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引进和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里要向读者作些说明,为什么要引进这套书,它有哪些值得一读的地方。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至今已20多年。改革开放不仅使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了很大改进。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访问和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或进修;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和传播媒介对国外情况的介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百姓享有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消费品,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各种物品;人员和物质的往来不断向着新的高度迈进。然而,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一个刚刚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仍然是有很大欠缺的,历史上“中央帝国”的某些遗留思想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正确认识。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众不同,由于经济能力和各种因素的局限,中国仅有很小一个比例的人能够出去看看走走,哪怕其数量比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大了不知多少倍。虽然外语学习在年轻一代人中早已蔚然成风,但必须承认,国民中能够用中文以外的文字和语言同外部世界交流和了解前沿知识的人恐怕是世界大国中比重最小的。

上述局面,与中国面临的压力和实际的需要是不相称的: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核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在

2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预防地区冲突和消除热点麻烦、防止核扩散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世界各地蔓延以及改革包括安理会在内的联合国各种职能机构等方面,对国际和平与世界稳定负有极大责任;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又是发展中世界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能源利用、生态保护、粮食增产、人口控制等方面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整个世界相关领域的现状及变化;中国正争取在国际社会拥有充分的和完全的代表权,如力争在国际洋底开发、南极条约改进及太空和平利用等方面有更大的参与机会及发言权。中国是世界一大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优良成分至今为世界所称道和使用,如何使之发扬光大,令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或“中国威胁论”等预言破产,在未来对中国亦有很大压力和考验。政治的、安全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都使中国处在一种特殊的“树未大先招风”的情势之下,让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无法无视这种局面。如果我们不真正了解世界,不真正了解中国人目前的国际位置和压力,不真正了解中国与世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难于持续的,中国也很难发挥与其幅员、人口、历史相适应的国际作用。

说到了解外部世界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说,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最近20年翻译出版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作品,无论其数量或学派,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的30年。然而,应当看到,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很不够。“很不够”的含义之一,是相对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或历史学等学科而言的,在那些学科领域,翻译过来的作品,不仅品种全、数量大,而且传到中国的速度快,例如,一些国际上获奖的作品(如诺贝尔经济学和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几乎立即能够见到中文译本,而国际关系学方面相形之下便差许多。最近20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这10多年中的一些

有影响的著作仅译出了很小一部分,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的著述,而多数在国外有影响、尤其是很有新意的作品则很少见到。与此相关,“很不够”的另一含义,是指已经翻译过来的作品,虽然很有见地,它们仅仅反映了很少几个学派(其中主要是权力政治学派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从作用上看主要着眼于外交和国际战略等领域“策论”的需要,而其他学派及研究角度就介绍得很少,尤其是那些对策性不一定很明显、但学术性比较强和注重方法论的理论,如建构主义学派、女性主义学派、生态政治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批判理论、学习理论和一些交叉性多学科的观点,等等。据我看,后面这些理论学说可能恰恰是中国同行在建立有自身特点和独立视角的工作中应当注意和可以借鉴的。国际关系学之所以被称作“学”,原因恰恰在于其有相对独立的本体论、方法论,有作为通常的国际关系研究之基石的范式与范畴,有关于如何传承思想、鉴别流派、比较对照的系统化知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奠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思路创新,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政治舞台和学术场合之更大建设性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与深化,离不开对国际上有关国际关系“学”的各种思考及其成果的吸收。

正是考虑到这种缺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斟酌之后,决定在今后若干年时间里,隆重推出“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为使这套丛书真正成为一个“拳头产品”,丛书延揽了国内外一批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组成了编委会,计划挑选当代国际关系学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派、理论、思潮和人物,分批分期翻译出版,争取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弥补出版界这方面的空白,使广大读者,特别是关心国际时事和政治的知识人,有更大的阅读选择面,能够比较不同观点和角度的长短优劣,充分地取“他山之石以攻玉”。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将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

作提供一套带有“案头书”性质的国际关系作品。此次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特聘的几位编委,都是目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最著名的中青年学者,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望,毫无疑问,他们的加盟是本丛书质量的首要保证。此外,出版社方面还专门聘请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和东亚事务专家江忆恩(Iain Johnston)教授担任本丛书编委,作为保证译著选材的前沿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些专家编委们的帮助下,浙江人民出版社能够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尽量挑选最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使广大读者读到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教学事业,进而为创立有中国人自身视角和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贡献力量。

从编委会和出版社的角度考虑,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该丛书的选材、理论深度和学术分量是极其重要的。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两批译著,就是经过反复酝酿斟酌、选了又选,在众多相当出色的作品中,最后被挑选出来的。编委们既充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以求扩大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来源,也认真征求了国外一些专家的意见,使选中的作品保持前沿性和较高的学术水准。比如,在第一批五本译著中,既有当今世界最有名望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的代表作(如克莱斯勒的《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也有近些年崭露头角的新锐作者的引起广泛好评的作品(如建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还有收录了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两大理论流派争论的重要文献、流传十分广泛的一本书(《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地域特色考虑,以及从读者关注的焦点与兴趣着眼,在第一批作品里,还选择了澳大利亚目前很有影响的两位国际政治学家的主要作品《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以及华裔美籍著名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学家熊玠教授的新著《无政府

状态与世界秩序》。在第二批五本译著里,我们第一次选择了欧洲学者的作品,将目前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新安全论”的代表作之一——巴里·布赞等人的《新安全论》——翻译出来推荐给中国读者;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作品中,选取了重视话语分析和场景分析的力作——克里斯汀·丝维斯特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尤其是瞄准近十余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知名度甚高的詹姆斯·德·代元教授,选定其集当代各主要流派之代表作于一体的《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一书,将这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有相当引征率的著作全部翻译出来;把国际关系学界最早阐述多边主义的专著、美国著名理论家约翰·鲁杰的《多边主义》收入;将目前可能是解析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内“认同意识和文化回归”现象的最出色著作之一、由所谓“第三次争论”的主要发起者和解说者的拉彼德和克拉托赫维尔两位教授编著的《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翻译出版。这两批作品角度各异,方法不一,观点不仅十分前沿,而且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我们深信,对它们的认真阅读、批判借鉴,将有助于了解国际上有关这一领域的最重要知识,展现国际关系学方兴未艾的多样性和复杂层次,大大开阔一般读者及研究人员的视野和思路。

考虑到目前国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世界问题教学的特点,这套书当然有可能成为国内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教学参考书之一。众所周知,最近十几年来,国家教委(现教育部)一直要求所有综合性院校开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课程,各地各院校编写及出版的相关的教科书已有近百本之多。然而,能够作为教学参考书使用的介绍国外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的作品却少而又少,而且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仅有的若干外国参考书籍多半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写作和出版的,这种情况自然令国内这方面专业的许多老师和学生感到了教学和研究中的诸多不便。浙江人民出版

6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社此次考虑出版的系列译著,便充分照顾到这方面的需求;这套丛书不仅要选取最主要的流派及方法论作品,而且将选择并出版一些国外国际关系专业的教材及参考书,尽可能使中国学生的学习视野、信息掌握以及研究方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同代人保持同步状态。我们相信,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这种愿望最终一定可以实现,“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将能成为一般读者,特别是喜好国际政治问题的青年人的良师益友,长久地驻留在读者们的案头上。

译者序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已深得世人关注,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新兴理论也已成为一个耀眼夺目的流派。本书作者以后现代国际关系的全新视域观照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变革历程,以及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内在关联,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女性主义(feminism)始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它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母系时代的母权制度到父系时代的父权制度后、进入到了全面向父权制度挑战以实现人类男女平等的“平权时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女性主义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使命是批评父权制社会,争取女性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与就业权等。

第二阶段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不再把批判的矛头单纯地指向男性,而是开始反思自己、批判自己。他们试图从女性自己的特征、生物机制等方面寻找受制于男性的原因,并提出各种改变和克服自我的设想。但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者仍然是争取政治、经济的权利,以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

第三阶段从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继续探

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其重点从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转向更深层的理论构建,研究女性学科正式进入大学课堂,并产生了当代各种女性主义的理论流派。其间,女性主义者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以后现代的“解构”方法,分析传统性别制度与不平等社会地位的根源,“解构”传统的学科领域,积极构建女性主义理论,进而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开始了女性主义对各个传统学科的“圈地”运动。

女性主义参与国际关系的三次争论,介入国际关系领域,以结束她们在这一领域中“无家可归”的状况,正是在“后现代”的背景下重新“叙述”女性“自我”的一个“故事”。本书作者关注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变迁中存在着长期排斥“女性”、否定其作用的现象,并试图以女性主义特有的方法论,打破传统性别故事中认定的种种歧视女性、排斥女性的看法,展示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拓展中所发挥的特有渗透作用。作者的目的是让女性主义的有效理论融入到男性主导的、单一化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使女性主义思想像一首抒情诗柔和地启示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进而为国际关系领域注入生机和活力。

二

全书围绕上述背景,分析了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的三次争论,阐述了女性主义者如何从理论与实践上参与该领域的“圈地”活动,构建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在“导论”中提出,性别“盲区”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所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至今,人们熟知的均是男性主导的声音,“男性”的角色常常是州长、政治家、战士、决策者、恐怖主义者、暴君以及那些权力比女性大得多的人物,男人生活在政府、社会契约

的“利维坦”中,而“女性”处于政治之外的私人领域中,只是“男权”政治的辅助而已。作者认为“男性”和“女性”在身体特征上只有细微差别,他们在政治化过程中才形成不同的主体身份,这种身份通过劳动分工、个性形成、地位的分派、权力的分配不断得以强化,女性地位的非自主性只是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政治文化标志。

后现代思维方式使得女性主义者能质疑现代社会制度的规章,质疑那些将性别知识已经合法化的科学标准。这种质疑总体上是分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即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愤世嫉俗中将所有的习俗和主体还原为碎石瓦砾,从而最终从自我决断中分离开来,将自身融入到多元的后建构主义中。它强调解构权威,包括解构那些一贯处在统治地位的男人所拥有的“自我”权威,进而成为一种“独特的知识类型”。后现代女性主义则运用性别扭曲现象和确凿的科学数据来判定我们对“女性”的科学理解,通过情感对话式的政治学来完成其理论“圈地”,通过移情作用的合作方式,揭示颠覆正常叙事的断裂性,揭示表面上看起来不像家的“家”,以及隐匿在错位的主体(比如“画家象”elephants)身上的“画家气质”。作者对女性主义研究的自身体验也反映了这种“后现代”的气质,如作者在导论中自述,她几乎走遍了整个地球,这使她几乎不知道她的归属在何方,甚至从来没有;但正是在这样“无家可归”的精神感觉的流变中,“她”作为紧张冲突的承受者定位于女性主义,这使她感到了体现着永恒性的片刻的快乐,也体验到了生活的更富张力与更具多变性。

在导论与章节之间,作者特别安排了一个引论,以导论为背景,进一步以对女性主义第一波的概述作为铺垫引出后继内容的切入点。

第一章对西方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及其实践

的兴起、发展的历史成因与价值追求进行了背景式描述。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对传统规范科学的“发现”进行质疑,提出了科学的“正当性”问题。现代科学似乎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评价女性行为的价值,但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这种科学已经因反对女性的社会偏见而受到严重污染。男性学者在科学领域中一统天下,他们的科学往往通过各种假设来测试各种观点,包括歧视女性的观点。女性主义则认为存在着“无视对象事物的描述与解释,而受制于研究者的兴趣、期望和实验方式的价值取向”的“坏科学”。为此,女性主义毫不留情地批评科学本身是个“肮脏的洗衣店”。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自视是一种革命性的认识论,并要用高尚的女性主义意识去纠正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则抓住科学理性中的非理性去揭示社会中的性别歧视现实,并把国家描绘成只是监视性别中立的法律代理机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致力于为“非问题化”(unproblematized)的女性提供渠道,使她们摆脱私人家庭的非理性空间而进入科学、政府、外交事务、工业、贸易和教育的理性领域,并且在报酬和地位上不受歧视,避免工作中的性骚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儿童发育成长的角度考察对社会的认同过程,提出了具有契约精神的“个人自治”、“关系自治”、“弹性自治”,并以此与体现男性之间‘统治——管理’和‘角色——界定’结构关系的“社会自治”相抗衡,进而解构社会实体的至高无上性,解构以规范与法律为基础的道德决定性,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与行动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起点。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以融合“本体论——认识论”为新的立场基点,它提出,为了明确地描述人性和社会关系,必须以女性生活的实际“定位”出发,而不是从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生活出发。它要求任何人把自己从权威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构建表象(世界)的

力量,去发现一个已经被歪曲但仍未被毁灭的真实世界”。因此“一个真实世界的表述不是依靠逻辑的发现,而是依靠‘商谈’的社会关系的权力改变”。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对自我、性别、知识、社会关系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怀疑;而后现代女性主义揭示了性别的隐喻,要求在我们的头脑中消除法西斯主义,建构起人类文本真正的开放品质。作者认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都转向了对性别的解构,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在于后者能够从容忍自我决断的政治向移情作用的政治转化。作者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激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似乎并不适合为一种具有后现代流行思想的流派,但将是最恰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学。因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着力寻找的是现实妇女在资本主义和父权统治两种制度交叉中受压迫的成因与出路,寻求对种族、性、性别、阶级斗争等包罗万象问题的一揽子解决。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作者阐述了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闯入”、“圈地”、“识记”的过程。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领域第一次争论的介入,体现的是女性为受到重视、发挥能动作用、参与著述、获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获得尊重和提升自我而作的斗争。不少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权威人士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不存在“为国际关系的‘女性’行为”和“为‘女性’行为的国际关系”的“特殊性别影响”(Halliday, 1988:420)。马基雅弗利看到的是“女性如何毁灭国家”,霍布斯认为女性仅有的是不独立的“对孩子的母权”,摩根索坚持认为要把人类欲望放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权力欲中,而不要放在某个典型的“男人”或“女人”领域内。因而,早期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缺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争论也没有导致两个性别群体形成国际关系日常事务的历史活动。作者认为:通过女性主义学术成果,我们可以提

到,一些“女性”帮助形成了主权国家,她们也通过明智的王室通婚帮助保卫了紧接的毗邻国土。在近现代,很多女性主义者在追求国际和平事业的同时,公开追求妇女参政的事业和女性主义的国家利益事业。在理论上,自由女性主义揭示了女性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文本的隔离性;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追问谁和为什么是“妇女”以及“我们”要贡献什么给国际关系,占据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边界、其他身份和位置;特别是女性主义对移情政治的重视,向我们展示了国际关系争论中被忽视的故事、人物和地点……作者强调,女性主义的闯入是一种警示,它提醒我们新的政治学产生于传统理论领域的重新阐释中,产生于争论中论点与论点的碰撞中,产生于抵御女性主义势力的意识觉醒中,产生于这种主体的完全构建中。

第三章作者着重阐述了国际关系领域第二次争论与女性主义的再次介入。国际关系的第二次争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第三波”重叠。

女性主义在“第二波”中寻求的是“我们是女人还是女性”的答案,究竟是谁提出了真正的“女权宣言”:女同性恋者、贫穷的有色人种妇女、白色人种的理论家、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者、第三世界的妇女,等等。作者认为,从女性主义的第三波开始,女性主义在理论建设中帮助我们记录了国际关系的当代性别困境,也帮助我们建构了准则和理想,包括平等、解放、分权和政治斗争。从激进女性主义的视野看,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让女性脱离整个父权制的托词。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视野看,女性为了拥有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只能作为被“保护”的替代品。女性主义对第二波和第三波的理论建设,与新现实主义的努力产生共鸣,重复了圈地的划界活动,当然现实主义对圈地划界的合理性问题有着自己的立场,